

評 Christian J. Emden, *Nietzsche's Naturalism. Philosophy and the Life Scienc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夏逸平*

摘 要

尼采的自然主義或者尼采作為自然主義者可以說是過去二十年英美尼采學界最為熱門的研究論題之一，而在所有相關作品中，Christian Emden 的《尼采的自然主義》則憑藉其出色的歷史脈絡化工作以及對哲學問題的敏銳關注而成為尼采研究領域不可忽略的著作。在書中，Emden 在十九世紀早期新康德主義以及生命科學的脈絡下重構了尼采的自然主義，並認為尼采的系譜學提供了對規範性的一個自然歷史的詮釋。本文將首先簡介在英美以及德國學界所展開的對尼采自然主義詮釋的爭論，接著概覽 Emden 一書的章節內容，隨後介紹以及評論此書的核心觀點，最後則以對當代尼采研究的簡短反思作為結論。

關鍵詞：尼采、自然主義、早期新康德主義、生命科學、規範性

* 夏逸平，德國弗萊堡大學哲學系博士候選人。

投稿：110 年 12 月 6 日；修訂：111 年 2 月 25 日；接受刊登：111 年 8 月 12 日。

**A Review of Christian J. Emden's
*Nietzsche's Naturalism. Philosophy and the Life
Scienc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Yi-Ping Xia*

Abstract

Nietzsche's naturalism or Nietzsche as a naturalist could be regarded as one of the hottest research topics in Anglo-American Nietzsche studies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Of all the related works, Christian Emden's *Nietzsche's Naturalism* is indispensable in the field of Nietzsche studies for its excellent historical contextualization and keen attention to philosophical problems. In this book, he reconstructs Nietzsche's philosophical naturalism in the context of early neo-Kantianism and the life scienc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interprets Nietzsche's genealogy as 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that delivers a natural history of normativity. This review will begin with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debate around Nietzsche's naturalism in Anglo-American and German scholarship, then give an overview of the chapters in Emden's book. After introducing and

*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lbert Ludwig University of Freiburg.

commenting on Emden's core ideas, it will conclude with a brief reflection on contemporary Nietzsche studies.

Keywords: Nietzsche, naturalism, early neo-Kantianism, life sciences, normativity

評 Christian J. Emden,
*Nietzsche's Naturalism. Philosophy and the
Life Scienc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夏逸平

書名：*Nietzsche's Naturalism. Philosophy and the Life Scienc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作者：Christian J. Emden（美）

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精裝本 2014，平裝本 2019）

壹、緒論：自然主義者尼采？

當代英美學界有關尼采的自然主義以及尼采作為自然主義者的討論最早或可追溯到 Richard Schacht 與 Bernard Williams。(參 Schacht, 1983; Williams, 1993)¹不過，要到 Brian Leiter 在 2002 年出版的《尼采論道德》(*Nietzsche on Morality*) 之後，自然主義才成為英美尼采學界最為熱

*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的寶貴建議，不僅幫助筆者完善了此文，並且避免了可能產生的錯誤。

¹ 事實上，德國學者 Alwin Mitsch 早在其《尼采作為自然哲學家》(*Friedrich Nietzsche als Naturphilosoph*) 中即基於自然哲學與文化哲學在尼采那裡的關聯性而將尼采的自然主義稱之為「精神化的自然主義」(vergeistigter Naturalismus)。參 Mitsch, 1952: 276。

門的研究論題之一。跟隨 Peter Railton 對「實質的自然主義」(substantive naturalism) 與「方法論的自然主義」(methodological naturalism) 的區分 (Railton, 1989: 155-156), Leiter 在書中明確指出「尼采的自然主義基本上是方法論的」(Leiter, 2002: 6), 即「哲學探究應當與科學中的經驗探究相連續」。(Leiter, 2002: 3) 哲學探究與經驗探究的「連續性」則可被區分為「結果連續性」(Results Continuity) 與「方法連續性」(Methods Continuity) 兩個方面, 換言之, 方法論的自然主義者不是依賴科學方法的實際成果來建構哲學理論, 就是採用並模仿獨特的科學方式來觀察與解釋事物。(參 Leiter, 2002: 5) 而在 Leiter 看來, 尼采的自然主義則同時包含了這兩個方面。尼采既吸收當時的科學研究成果 (特別是生理學) 來解釋人類的各種現象 (尤其是道德現象), 又以科學為範式來揭露這些現象背後的因果決定因素, 尤其是「關於人的生理學與心理學事實」。(Leiter, 2002: 8)

Leiter 的作品出版後, 掀起了有關尼采的自然主義的討論。儘管高度評價了 Leiter 的詮釋, 但 Ken Gemes 與 Christopher Janaway 亦點出 Leiter 詮釋下的尼采乃是「一個為了英美讀者而消毒淨化後的尼采 (a sanitizing Nietzsche)」。(Gemes & Janaway, 2005: 739) Janaway 在其出版於 2007 年的《超越無私: 解讀尼采的〈系譜學〉》(*Beyond Selflessness. Reading Nietzsche's Genealogy*) 中則進一步指出尼采的哲學探究方法並非如 Leiter 所言是以經驗科學為範式, 反而經常「並不與經驗的科學探究相連續」。尼采那種非常文學性的、情緒性的、個人化的修辭學則被 Janaway 詮釋為通向療癒與教育目的的手段。(參 Janaway, 2007: 39, 44-48) 不過更加重要的是, Janaway 注意到那些 Leiter 所認為的用以解釋道德現象的「生理—心理學事實」「本質上乃是由文化所塑造的」。(Janaway, 2007: 47) 換言之, 我們對於人的「生理—心理學事實」的

認知離不開更大的文化脈絡。如果尼采對道德價值的因果解釋是自然主義式的話，那麼「自然」並不僅僅包含人的生理—心理構造，同時亦是「複雜的文化現象」。(Janaway, 2007: 53) 承接著 Janaway 的論點，Richard Schacht 則批評 Leiter 所建構的尼采的自然主義過於科學主義 (scientific)，基於尼采對「歷史地進行哲學思考」的強調，Schacht 認為尼采的自然主義毋寧是一種「歷史—發展型的自然主義」(a historical-developmental naturalism)。(Schacht, 2012a: 241-243; 亦見 Schacht, 2012b) 在這個基礎上，Schacht 進一步指出對尼采而言，規範性不能建立在任何超越現實生活的「理性」基礎之上，與「人的生活方式」相分離的規範性就只是空洞的抽象而已。(Schacht, 2012a: 248) 由 Janaway 與 Simon Robertson 所編輯的《尼采，自然主義與規範性》(*Nietzsche, Naturalism and Normativity*) 則於 2012 年出版，匯集了此一階段不同學者對於相關問題的不同詮釋。(參 Janaway & Robertson, 2012)

而這些在英美學界所進行的討論同樣得到了德國學者的關注與反饋。Helmut Heit 首先指出學者們在界定自然主義這個概念時的困難：如果我們將自然主義這個概念的定義放寬，那麼今日我們都是自然主義者，而一個內涵過於寬鬆的概念將失去其所指；但如果我們對自然主義提供一個清楚而明晰的定義，那麼就很難套用到尼采身上。(參 Heit, 2016: 63) 憑藉對《善惡的彼岸》(*Jenseits von Gut und Böse*，以下簡稱《彼岸》) 第一章的詮釋，Heit 指出尼采固然吸收了當時代的科學理論與成果，然而這種吸收一方面是極具選擇性的，另一方面尼采也未將其置於經驗測試之下。而此一對科學理論的保留態度源自尼采對知識 (論) 的批判與實驗性態度，對尼采而言，任何科學命題都是假設性的，它們處在特定的歷史脈絡之下且與我們的視角性詮釋無法分離。因而，Heit 認為尼采並沒有「讓科學成為你的嚮導」這樣的信念，而毋寧是「以一

種實驗的方式採用了自然化的視角」。(Heit, 2016: 68) Jakob Dellinger 則透過細緻的文本分析, 指出 Leiter 的詮釋既簡化了哲學術語在尼采那裡的多義性(例如「科學」與「真理」的概念), 易忽略了尼采顛覆性的寫作策略。(參 Dellinger, 2012) 而當 Rogério Lopes 指出 Leiter 以經驗科學為範式的因果解釋模型過於狹窄而無法適用於尼采, 且 Leiter 誤解了尼采哲學的歷史脈絡時(參 Lopes, 2011: 114-116)², Marco Brusotti 亦正確指出尼采「不僅想要將歷史與人文科學自然化, 同時亦想將自然科學(其實是所有科學)給歷史化」。(Brusotti, 2011: 92) 對大多數德國學者而言, 與其將尼采標籤化或呈現一個「消毒淨化後的尼采」, 倒不如透過細緻的文本分析與歷史脈絡化工作去呈現尼采複雜而豐富的哲學思考層次。

而在關於尼采自然主義的作品中, Christian Emden 出版於 2014 年的《尼采的自然主義: 十九世紀的哲學與生命科學》(*Nietzsche's Naturalism. Philosophy and the Life Scienc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則憑藉其厚重的歷史脈絡化工作與對哲學問題的敏銳關注, 使其在尼采研究中佔據了一個出色且不可忽略的地位。以下, 本文將首先概覽 Emden 一書的各章節內容, 接著對其核心方法與觀點做出評論, 最後則以對當代尼采研究的簡短反思作為結論。

² 雖然 Leiter 看到了十九世紀德國唯物論以及新康德主義者弗里德里希·朗格(Friedrich Lange) 對尼采的影響, 但他沿著布希那(Ludwig Büchner)、莫勒肖特(Jakob Moleschott) 等唯物論者的思路來理解尼采事實上是成問題的, 他沒有注意到影響尼采的或者說尼采的思想脈絡恰恰是對唯物論提出激烈批評的早期新康德主義。參 Leiter, 2002: 63-71。而此一歷史脈絡被 Emden 在其書中充分展開。

貳、章節概覽

Emden 一書的核心目標在於藉由重構尼采的哲學自然主義以及揭示尼采的自然主義及其對生命科學的理解是如何與系譜學相關聯的，以回答究竟何謂尼采所說的「將人重新轉換回自然」(JGB 230, KSA 5, 169) 與「將我們人……加以自然化」(FW 109, KSA 3, 469)。核心問題在於，我們如何不訴諸於任何外在於我們作為自然存有者 (natural beings) 的規範性標準而獲得一種對規範性的理解。在此，「規範」既包含了認識層面，也包含了道德層面我們所應遵循的那些規範。而尼采的自然主義則認為那些我們視之為規範性的東西，既不外在於我們的自然存在，亦不位於歷史性的脈絡之外，而毋寧已是我們作為自然存有者的構成性要素。在這個思路之下，Emden 認為尼采的系譜學「應被理解為一種哲學批判，其設法提供一個規範性的自然歷史 (a natural history of normativity)」。(Emden, 2014: 3) 然而不同於大多數分析哲學出身的英美學者不是完全忽略尼采的歷史脈絡就是將其簡化為一個或兩個核心主題，Emden 所採用的則是一種「有厚度的歷史脈絡化」(thick historical contextualization) 方法 (Emden, 2014: 2)³，即——如此書的副標題表示的——在「十九世紀哲學與生命科學」的脈絡下重構尼采的自然主義。

在第一部分「哲學自然主義的類型」的第二章「新康德主義姿態」中，Emden 即具體化了「十九世紀的哲學」指的乃是十九世紀下半葉的第一代 (或早期) 新康德主義，其代表人物包含了享有盛名的自然科學家赫爾曼·馮·亥姆霍茲 (Hermann von Helmholtz)，新康德主義者朗格、奧托·李普曼 (Otto Liebmann)、奧托·卡斯帕里 (Otto Caspari) 等。

³ 此一方法亦被 Emden 在其另外兩部尼采研究中所採用。參 Emden, 2005 與 Emden, 2008。

第一代新康德主義乃是在應對十九世紀中葉唯物論的挑戰中所興起，然而不同於後來的新康德主義者赫爾曼·柯亨（Hermann Cohen）或保羅·納托普（Paul Natorp）批判心理主義與自然主義而試圖挽救康德的先驗哲學，他們的「回到康德」則呈現出鮮明的自然化與懷疑論特徵。他們大多數人不僅拋棄了康德的物自身概念⁴、批判康德的先天範疇、同時亦將認識過程奠基在感官生理學上，如同朗格跟隨他的老師亥姆霍茲所說的：「感覺器官的生理學才是成熟的或有根據的康德主義」。（Lange，1866：482）然而，由此卻產生了一個知識論上的弔詭：「如果被感知的現實結構自身乃是身體的產物，而觀察者和認知著的自我又始終是世界的一部分，那麼就缺少任何建立在理性自律性（autonomy of reason）基礎上的優先視角」。（Emden，2014：23）在 Emden 看來，從青年時代到晚期的哲學思考，尼采持續地受到早期新康德主義者的影響並且從未放棄這樣一種新康德主義的思考框架。既然我們藉以認識世界的內在感覺器官同樣乃是外在世界的一部分，那麼我們就根本沒有任何先驗的知識立足點。⁵只不過 Emden 認為，尼采並沒有興趣解決此一弔詭，而毋寧將其視作是一個思考「規範世界」與「經驗世界」的起點，即「將它們相互折疊」（folding them into each other），而「這構成了尼采哲學方案的核心特徵」。（Emden，2014：32、33）

在第三章「尼采的反達爾文主義？」以及第四章「心理學，實驗與科學實踐」中，Emden 則強調了三個重點。首先，尼采晚期對達爾文主

⁴ 例如李普曼曾用「木質的鐵」（hölzernes Eisen）這樣的形容詞矛盾（*contradictio in adjecto*）來描述「物自身」，（Liebmann，1865：27）這個說法亦被尼采採用。參 NL 1884 26[413]，KSA 11, 262 與 JGB 16, KSA 5, 29。

⁵ 指標性的文本當然是《彼岸》第 15 節：「什麼？其他人甚至說外在世界是我們器官的產物？但這樣的話我們的身體，作為外在世界的一部分，也就是我們器官的產物！然後我們的器官也就將是——器官的產物！這在我看來是一個徹底的歸謬法（*reductio ad absurdum*）：假定自因（*causa sui*）的概念是某種徹底荒謬的東西」。（JGB 15, KSA 5, 29）

義的批判並不意味著尼采的「反達爾文主義」，尼采反對的毋寧是以恩斯特·海克爾（Ernst Haeckel）⁶，大衛·史特勞斯（David Strauss），赫伯特·史賓塞（Herbert Spencer）為代表的流行版本的達爾文主義（popular Darwinism），一方面針對其目的論色彩，另一方面針對其在社會倫理領域的運用。相較於海克爾演化論中的目的論色彩以及源自德國浪漫主義傳統的自然哲學（Naturphilosophie），德國動物學家卡爾·森普爾（Karl Semper）以及曾任巴塞爾大學解剖學與生理學教授的威爾漢·希斯（Wilhelm His）等則試圖將達爾文的演化論與德國的動物形態學（animal morphology）相關聯，從而對有機生命從細胞、器官到物種的演化過程給出更為機械論式的解釋。而尼采對演化論的吸收，則使其意識到傳統哲學所討論的「理智與自然、心智與身體的關係都建立在錯誤的對立上」，「有機生命與理智之間的連續性在尼采的自然主義中佔有中心地位：理智乃是有機體的連續與結果」。（Emden，2014：45）其次，Emden認為尼采對道德的心理學分析並不能——如一些英美學者所做的——單純從道德心理學的角度進行詮釋。一方面，尼采在《彼岸》中將「通向根本問題」的心理學稱之為「生理—心理學」（JGB 23, KSA 5, 38）；另一方面，隨著實驗心理學家、《生理心理學基本原理》（*Grundzüge der physiologischen Psychologie*）的作者威廉·馮特（Wilhelm Wundt）⁷在1879年創建第一個心理學實驗室以來，心理學就逐漸脫離個體式的內省方式，而被納入了實驗之中。而作為劍橋生理學家邁克·福斯特（Michael

⁶ 尼采在遺稿中提及過海克爾（如 NL 1875 12[22], NL 1880/81 8[68]）。我們無法確定尼采是否直接閱讀過海克爾，但海克爾無疑出現在尼采閱讀過的其他生物學或哲學書籍裡。

⁷ 尼采曾在1887年給出版商的信中列了一張名單，委託出版商將《論道德系譜學》（*Zur Genealogie der Moral*，以下簡稱《系譜學》）的多餘副本寄給名單上的人。其中除了尼采的一些親友外，還包含了威廉·馮特、亥姆霍茲、生理學家埃米爾·杜布瓦—雷蒙（Emil du Bois-Reymond）、德國動物學家魯道夫·洛卡特（Rudolf Leuckart）以及實驗物理學家、哲學家恩斯特·馬赫（Ernst Mach）。參 KSB 8, 187-188。

Foster) 的讀者，尼采無疑清楚如今人的身體就如同青蛙的身體一般成為了實驗裝置的對象。而由此即來到了 Emden 的第三個論點，即科學實踐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與實驗性，尼采看重的乃是科學實踐的實驗性面向而非對真理的客觀追求。(參 Emden, 2014: 56-59)

在第二部分「演化與目的論的限制」中，Emden 在論述完尼采早期如何在康德與生命科學的脈絡下思考目的論的問題（第七章「目的性的問題」）以及為何拒絕在十九世紀現代性經驗中流行的「進步的意志形態」（the ideologies of progress）後（第八章「進步的政治」），便將論述重點轉向了尼采對因果律作為普遍法則的批判。Emden 首先凸顯了物理學家羅傑·博斯科維奇（Roger Boscovich）⁸與哲學家馬克西米利安·德羅斯巴赫（Maximilian Drossbach）對尼采的影響。不同於從笛卡爾到康德對因果律的討論往往大體上是基於物體與空間事件之間的相互作用，博斯科維奇指出自然並非由原子這種最小的物質單位所構成，而應被理解為動態的力量場域（force fields）。⁹這種對生成世界的強調消解了建立在物

⁸ 尼采的個人圖書館中並沒有博斯科維奇的作品，但尼采很可能早在朗格的《唯物論歷史及其當代意義的批判》（*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 und Kritik seiner Bedeutung in der Gegenwart*）中即已接觸了博斯科維奇的理論。在《彼岸》第 12 節中，尼采明確借用博斯科維奇來反對物質原子論，而在遺稿中則將博斯科維奇的思考方式稱之為「動態的世界沉思」（NL 1884 26[410], KSA 11, 261）。有審查委員指出，尼采亦可能在 1873/74 年經由德國物理學家與哲學家古斯塔夫·費希納（Gustav Fechner）的《論物理與哲學原子論》（*Über die physikalische und philosophische Atomlehre*）而知悉博斯科維奇的理論。在此感謝審查委員的此一補充。

⁹ 有審查委員指出，在此不應該忽略尼采對德國物理學家尤利烏斯·羅伯特·邁爾（Julius Robert Mayer）的批判。在 1882 年給友人的書信中，尼采一方面批判邁爾仍將原子視作是承載力的實體，另一方面則批判在邁爾的理論中，仍需要第二種力來解釋現象在質上的各種不同表現形式，這種做法在尼采看來無異於主張運動除了作用力之外，還需要另一個力以之為引起運動的目的，它扮演了第一動者或上帝的角色。參 KSB 6, 183-184。感謝審查委員的此一補充，其實在同一封書信中，尼采正是將邁爾視作是博斯科維奇的對立面來批判的。不過一方面，如審查委員亦指出的，尼采在運動學說方面對邁爾持批判態度，那麼邁爾就算不上是對尼采產生積極「影響」的人，因而 Emden 在此未提及邁爾或許情有可原；另一方面，Emden 同樣知道尼采對邁爾唯物論立場的批判，只是他試圖凸顯邁爾在熱力學方面對尼采所產生的積極影響，即能量在轉化過程中總是產生了很多的浪費／損耗，由此來表明生命或自然的特徵並非是自我保存（參 NL 1881 11[24], KSA 9, 451），而毋寧是力量的浪費或擴增。參

質基礎上的自然概念，因而「因果關係也不可能是空間中的物體、物質世界的屬性」。德羅斯巴赫則認為原因與結果之間的清楚區分是獨斷的，畢竟任何的原因自身也可能是結果，而每一個事件毋寧是「一個相互作用的過程」。(Emden, 2014: 107、108) 但尼采對因果律作為普遍法則的批判並不意味著尼采徹底拋棄了因果律。事實上，Emden 認為尼采會同意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的「經驗類比」中將因果律視作是「調節性的觀念」(regulative idea) 的說法，只是尼采並不認為因果律可被歸屬於一個先天範疇：「人們不應該像自然研究者們所做的那樣……，有缺陷地將『原因』與『結果』加以物化；人們應該只將『原因』與『結果』當做一些純粹的概念，亦即：當做是為了標示與互相理解這個目的而設的一些約定俗成的虛構物、而不是說明加以利用」。(JGB 21, KSA 5, 35f.; 亦可參 FW 112) 因果律作為一個「調節性的原則」能夠使我們把握、理解並安置現實的連續體 (continuum)，但這並不意味它是某種普遍的法則，而毋寧——從生物演化的角度出發——只是在相互理解與溝通的生物性需求中扮演了一種「演化論的功能」，「尼采將一切康德視之為先天的東西都自然化了」。(Emden, 2014: 121)。

在第三部分「系譜學，自然與規範性」中，Emden 首先承接著第三章「尼采的反達爾文主義？」中的討論，指出尼采為何會反對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史賓塞將演化論運用於社會倫理領域(第十二章「『達爾文主義』的形上學錯誤」)。當史賓塞認為生物的演化機制會自動使得生物克服其利己主義傾向從而走向一個利他且無私的社會時，他只是將一個目的論的理想投入了現實之中而已，因而在尼采看來這仍然只是一套建立在猶太—基督教傳統上的道德罷了。然而，十九世紀的達爾文主義絕不是一

個統一的學說，其內部同樣存在著不同的方法與觀點。不同於達爾文憑藉「生存鬥爭」以及史賓塞憑藉「適者生存」來解釋物種演化，生物學家威廉·亨利·羅爾夫（William Henry Rolph）與威爾漢·魯（Wilhelm Roux）則為尼采提供了另一種解釋模型。對前者而言，達爾文無法解釋為何生命除了自我保存還有自我提升、增強的特徵，是「生命的擴張鬥爭」而非「生存鬥爭」才造就了物種的演化；對後者而言，達爾文的「環境適應」解釋仍不足夠，我們必須將有機體內各種細胞、組織間的「鬥爭」（Kampf）也納入考量。Emden 在此之所以強調生物學的爭論，乃是為了凸顯權力意志（Wille zur Macht）所代表的兩個意義。第一，代表「力量增長」、「克服抵抗」的權力意志乃是「我們作為擁有分子、細胞、器官等自然存有者之存在的構成性要素」；（Emden，2014：183；亦參 Emden，2014：146）第二，如此一來，建立在權力意志基礎上對道德起源進行描述的系譜學就是尼采對「規範性秩序之產生的自然主義解釋」。（Emden，2014：146）當然，尼采並未將權力意志視作一個形上學原則，而毋寧是一個「嘗試」，一個「詮釋性的實驗」。（Emden，2014：181）在這樣一種自然主義的思路下，社會實踐（social practices）同樣可被視作是有機生命功能的延續，不論是尼采藉由暴力在身體中的內化（記憶術）來解釋人之規訓以及「理性」的產生，（GM II 3）還是他透過動物性衝動本能的內化來解釋「罪咎意識」（schlechtes Gewissen）這種道德感受的產生，均透露出道德與社會實踐的自然基礎。（GM II 16）如此一來，尼采自然不會滿意將社會（或國家）建立在「契約」這樣空洞的想象上，國家的誕生毋寧是一群統治階級在自然歷史中所開啟的一個「跳躍」。（參 Emden，2014：196；GM II 17）作為為規範性提供一個自然歷史之解釋的系譜學，讓我們意識到人絕不是自然之中或之外的一個特殊存在，而徹徹底底是自然的一部分。這當然並不是否認人之為人的獨特

性（例如理性、意識或道德），而只是拒絕訴諸任何超自然的原則來解釋人之獨特性的產生。在最後一章「『道德中的自然主義』」中，Emden 亦批駁了當代英美學界中對尼采道德哲學「實在論」與「反實在論」的爭論，而認為尼采的自然主義超出了「實在論」與「反實在論」的框架。原因在於，不論是「實在論」或「反實在論」都需要一個「優先的知識論立場」以便對「實在」或「虛構」做出一個客觀的區分，但身為自然存有者的我們並沒有任何先驗的知識立足點（尼采的早期新康德主義姿態），這種區分只是重新塑造著我們去理解何謂「實在」或何謂「自然」，而不會是「客觀有效」的區分。（參 Emden，2014：211-212）

叁、尼采的思想脈絡、自然主義與規範性問題

一、早期新康德主義與生命科學的歷史脈絡

從 Emden 一書的研究方法即可看出，比起大多數英美尼采研究者，身為萊斯大學（Rice University）德國思想史與政治思想教授的 Emden 對德國思想史擁有更深更廣泛的理解。而他對尼采哲學歷史脈絡化的工作並不建立在單純的思辨關聯上，而是一方面借用德國尼采研究傳統中（也是古典語文學傳統）的文獻來源研究（Quellenforschung），另一方面憑藉《尼采的個人圖書館》（*Nietzsches persönliche Bibliothek*）與〈尼采巴塞爾大學圖書館借書清單〉（"Verzeichnis der von Nietzsche aus der Universitätsbibliothek in Basel entlehene Bücher"）兩份索引目錄，（參 Crescenzi，1994；Campioni et la.，2003）將尼采的思想脈絡建立在尼采的閱讀基礎之上，從而也更為可靠。《尼采的個人圖書館》不僅列舉了尼采所擁有的書籍，同時還標識了尼采在哪些書上留下了閱讀痕跡。

正是在這些工具的輔助下，我們擁有明確的證據知道尼采閱讀並研究了朗格的《唯物論歷史及其當代意義的批判》，李普曼的《康德及其追隨者》(*Kant und seine Epigone*)、《論對實在之分析》(*Zur Analysis der Wirklichkeit*)與《思想與事實》(*Gedanken und Thatsache*)，卡斯帕里的《事物的關聯》(*Der Zusammenhang der Dinge*)，史賓塞的《倫理學事實》(*Die Thatsache der Ethik*)，德羅斯巴赫的《關於世界中事件的表面與真實原因》(*Ueber die scheinbaren und die wirklichen Ursachen des Geschehens in der Welt*)等等。而在生命科學或自然科學方面，我們知道尼采分別於 1870 年與 1873 年從巴塞爾大學圖書館借閱了亥姆霍茲的《聲音感覺學說作為音樂理論的生理學基礎》(*Die Lehre von den Tonempfindungen als physiologische Grundlage für die Theorie der Musik*)與《生理學光學手冊》(*Handbuch der physiologischen Optik*)，他擁有並閱讀了森普爾的《動物的自然生存條件》(*Die natürlichen Existenzbedingungen der Thiere*)、希斯的《我們的身體形式及其起源的生理學問題》(*Unsere Körperform und das physiologische Problem ihrer Entstehung*)與福斯特的《生理學手冊》(*Handbuch der Physiologie*)，而對於魯的《有機體內部分間的鬥爭》(*Der Kampf der Theile im Organismus*)與羅爾夫的《生物學上的諸問題：同時作為發展某種理性的倫理學之嘗試》(*Biologische Probleme zugleich als Versuch zur Entwicklung einer rationellen Ethik*)兩本反達爾文主義著作尼采不僅高度評價亦將其思想（乃至文字）納入了自己的作品中。除此之外，他亦對英國社會經濟學家瓦爾特·白芝浩 (Walter Bagehot) 的《國族的起源》(*Der Ursprung der Nationen*)與奧地利文化歷史學家弗里德里希·馮·赫爾瓦德 (Friedrich von Hellwald) 的《自然發展直至今日的文化史》(*Kulturgeschichte in ihrer natürlichen Entwicklung bis zur Gegenwart*) 有所吸收與批判。¹⁰

¹⁰ 白芝浩一書的英文標題乃是《物理學與政治學》(*Physics and Politics*)，其副標題則為「將

在此所列舉的僅僅是 Emden 所建構的「歷史脈絡」的一小部分，Emden 的歷史脈絡化工作還深入到了到了尼采波恩學習時期的教授以及訂閱的刊物等等。就此而言，Emden 的尼采詮釋無疑有著堅實的基礎，同時亦表明尼采所讀到的康德已是一個自然化的康德¹¹，而對道德的自然主義詮釋同樣也已展開（例如在他七十年代的好友保羅·雷（Paul Rée）那裡）。略為可惜的是，Emden 對叔本華以及另一位影響尼采的新康德主義者庫諾·費舍爾（Kuno Fischer）卻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對叔本華的討論主要在反目的論的部分出現，（參 Emden，2014：109-111）而費舍爾則僅在注釋中出現。（參 Emden，2014：84 n6、109 n36）然而事實上，叔本華早已先於尼采將理智視作是大腦的功能並突出生理學在認識活動中的地位（儘管仍帶有活力論色彩）¹²，而尼采不僅早在六十年代即閱讀了費舍爾，在八十年代對費舍爾的閱讀亦促使其進一步反思康德的知識論（遺稿 NL 1887 7[4]）。¹³除此之外，倘若 Emden 對二手書籍的引用能夠帶上尼采個人的閱讀痕跡（諸如劃線、書頁邊緣註記等）並加入更細緻的文本分析，那麼就將更進一步加強尼采思想與其「歷史脈絡」之間的關聯。¹⁴

『自然選擇』與『遺傳』原理運用到政治社群的思考」，這是一個非常典型地借用達爾文主義的生存鬥爭學說來解釋國家起源的做法。這種不依賴契約理論來解釋國家起源的做法雖然吸引到尼采，然而尼采並不滿意於其中所帶有的目的論式的進步色彩。參 Emden，2014：97-99。

¹¹ 尼采學者們已經認識到尼采對康德的接受基本上是二手的，就此而言，唯有透過尼采閱讀的二手書籍才能了解尼采是如何理解以及批判康德的。可參 Brusotti & Siemens，2017：1-27。

¹² 有關叔本華在意識問題上對尼采的重要影響可參 Constâncio，2011。

¹³ 費舍爾通常被認為是尼采獲取哲學史知識的重要來源，同時亦影響了尼采對史賓諾莎的理解。可參 Sommer，2012。

¹⁴ 一位審查委員指出，主張尼采受早期新康德主義影響，因此將思考「規範世界」與「經驗世界」的問題視作「尼采哲學方案的核心特徵」不論在量或質上要作為尼采思想的主要歷史脈絡都缺乏明顯而直接的說服力。另一位審查委員則提及，有學者認為 Emden 的某些研究混淆了「科學史」的層次與「尼采原始資料研究」的層次，往往無法找到尼采的文本證據，證明尼采的確曾深入探討相關著作並從中取得成果。這兩個問題具有類似性，因而筆者在此一

二、尼采的自然主義

在第一部分的第五章「三種自然主義」中，Emden 重點闡述了他所理解的尼采的自然主義。首先與 Leiter 一樣，Emden 同樣反對實質的自然主義，認為其不僅在哲學上站不住腳，亦無法適用於尼采。其次，他則對 Leiter 方法論的自然主義式詮釋提出了三點批評：第一，十九世紀的生命科學具有高度的實驗性特徵且各學科之間（甚至同一學科內部）不具有方法論上的統一性，將尼采的自然主義與自然科學的經驗探究相關聯既忽略了尼采對自然科學的複雜態度，亦不適用於當時的科學發展情況。尼采固然吸收當時代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然而這不代表尼采認為它們就是可被經驗驗證的真理，而當 Leiter 試圖藉由當代認知科學的成果以試圖證實尼采對道德的心理學詮釋時，他的方法論自然主義詮釋不僅與尼采的懷疑主義無法相容，且仍免不了實質性的意涵。第二，Leiter 不夠重視權力意志這個尼采晚期哲學思想的核心，這使得他的詮釋建立在對尼采文本選擇性的閱讀上。第三，Leiter 排除了尼采系譜學創造性以及規範性的面向，即不同的或新的規範性秩序如何產生的問題。（參 Emden, 2014: 63-65）參考同樣受尼采影響的科學哲學學者 Joseph Rouse 的觀點（參 Rouse, 2002），Emden 提出了第三種對尼采自然主義的詮釋

併回復。首先，Emden 對早期新康德主義的強調以及將規範世界與經驗世界之關係的問題視作是「尼采哲學方案的核心特徵」的說法確實有些過強了，但我們同時也應注意到 Emden 畢竟不是在處理「尼采的整個哲學」這樣龐大的問題，而是對自然主義與知識論等特定問題的研究。而在這些方面，尼采與早期新康德主義的關聯基本上已被大量研究並得到承認。除了本文所引用的一些文獻外，尼采與朗格的關係早已有專書處理，參 Stack, 1983；而早期新康德主義在知識論上對尼采的影響則可參 Riccardi, 2014。其次，兩位審查委員的問題均指向了一個關於尼采文本或尼采如何寫作的問題，那就是尼采往往在其出版作品中隱藏了其文獻來源（Quelle），有些來源可在遺稿中找到，有些則在遺稿中也沒有。例如尼采從未在出版作品中談到朗格、李普曼、魯或羅爾夫等人，這確實會令人產生「缺乏說服力」或「無法找到尼采的文本證據」這樣的質疑。這也是為何筆者認為 Emden 可在語文學上再多下功夫的原因，如此一來當可避免這些誤解。

進路，並將焦點從科學方法轉向了我們實際與物質世界的互動方式：「如果人是自然存有者，那麼由這種存有對現實所做出的任何規範性宣稱，以及任何支配這些宣稱的規範，都必然鑲嵌（embedded）在與現實的物質以及概念互動當中」。（Emden，2014：66）換言之，我們無法預先規定是什麼構成了「科學」、「方法」乃至「自然」，因為我們對「科學」、「方法」與「自然」的理解均是在我們與世界的互動當中產生的，而所有這些理解與規定本身同樣也是自然的一部分。「科學實踐所揭露的，並非是獨立於我們與我們的關切的各種對象與法則，而是我們亦是其中一部分的各種現象（phenomena that we are part of）」。（Emden，2014：66；Rouse，2002：331）

我認為 Emden 在此對尼采的詮釋是相當貼切的。事實上，在其所謂的「實證主義」階段對道德、知識、宗教進行自然主義詮釋的同時，尼采就已經展開了對「科學」以及「科學方法」的反思：「確信（Überzeugungen/convictions）是一種信念，相信在知識的某個點上獲得了無條件的真理。這個信念預設了無條件真理的存在，以及那些達到它的完美方法已被找到；最後，每個擁有確信的人都會使用這些完美的方法。這三個提法立刻證明了，確信之人並不是科學思考之人」。（MA I 630, KSA 2, 356）相信透過一種完美的方法從而找到無條件的真理，這反而被尼采視作是「科學思考之人」的對立面。在寫於 1887 年的《快樂的科學》（*Die Fröhliche Wissenschaft*）第五卷中，尼采亦指出：「在科學中，確信並沒有公民權，這麼說是有好理由的：只有當它決心下降到一個假設的、一個暫時性的嘗試立場、一個調節式的虛構（regulative Fiktion）這樣一種謙虛時，它才會在知識的王國裡被賦予入場許可乃至特定的價值」。（FW 344, KSA 3, 574）尼采對「科學」的反思事實上可關聯到晚期對「求真理之意志」（Wille zur Wahrheit）的反思，對某物的「確信」仍是一種將

「真理」視之為比「非真理」更有價值的表現，既沒有質問這樣一種價值設定從何而來，亦沒有意識到也許「非真理」才對生命更有益處。（可參 JGB 1, 2, 24; FW 344; GM III 24）尼采當然對科學有所尊敬，但他同時也意識到，在一個激進的歷史視野下，我們對「科學」與「方法」的理解其實都在不斷變化，它們根本上乃是「假設、暫時性的嘗試立場、調解式的虛構」。

三、系譜學：規範性的自然歷史

雖然 Emden 的尼采研究放置在十九世紀的歷史脈絡之中，但他同樣試圖回應發生在當代英美倫理學中的相關討論。對尼采系譜學的自然主義詮釋，潛在的參照對象或者說批判對象即是克里斯汀·柯斯嘉（Christine Korsgaard）將規範性建立在理性自律性基礎上的康德式進路。（參 Emden，2014：187-188）如果理智（Emden 亦用了「心智」〔mind〕一詞）乃是自然演化歷史的產物，那麼規範性的來源無疑也就被自然化了。人並不是自然中一個特殊的存在，而是如自然中所有其他生物一樣擁有「權力意志」（即「克服抵抗」或「追求力量增長」）的自然存有。所有對自律性的宣稱其實都是被人的生物性構造（或需求）所型塑，如此一來，尼采正是在嘗試切斷自然世界與人的價值世界之間的區分：「就如同人的意識並不必然與無意識的衝動、本能相對立，價值與評價也必然是具身的（embodied）……它們是我們演化歷史的一部分」。（Emden，2014：188）

Emden 的詮釋首先建立在文本基礎之上，不僅僅因為尼采常常從有機生命發展的自然歷史角度來解釋意識或理智的產生（如 FW 11, FW 354），同時也因為尼采在《系譜學》中明確指出：「對於迄今為止價值評價的價值問題，生理學與醫學的參與當然是有必要的」。（GM I 17,

KSA 5, 289) 價值評價並不僅僅是一個道德問題，而同時是一個生理學或生物學問題。但更重要的是，Emden 提供了一個更大更豐富的視角，來理解尼采為何將迄今為止幾乎所有的道德（基督教道德、康德與叔本華的倫理學、效益主義、達爾文主義的倫理學等等）都視作是「反自然」與「敵視生命的」（如 GM III 10；GD Moral 1-6；AC 11, 15, 18）以及尼采為何呼籲「重新將人轉換回自然之中」。原因就在於任何規範性的要求都不應該建立在一種否定生命的、對規範性的超自然理解上，而是應被視作來自於對規範性的自然化理解。然而由此卻也產生了一些疑慮。當 Emden 將權力意志視作是有機生命的構成性要素時，他將新規範性秩序的產生也建立在權力意志的「克服抵抗」或「自我克服」上，然而除了引用尼采在《系譜學》中略帶有黑格爾式味道的「在生命本質中的必然的『自我克服』這個法則」以及將這幅未來圖景描述成「所有戲劇中最可怕、最可疑、但或許也是最富有希望的」之外，（GM III 27, KSA 5, 410-411；Emden, 2014：202-203）他並未進一步闡明新的規範性秩序如何出現以及此一新規範性秩序具有什麼樣的特徵。尼采提出了一幅理想的規範性圖像嗎？亦或系譜學僅僅是尼采對基督教道德起源的回溯性詮釋？我們該如何理解尼采在一些文本中對「偉大個體」的呼籲？尼采筆下的未來哲學家帶有濃厚的懷疑主義特徵，但身為價值創造者的他們又要（或又能）創造出什麼樣的價值？當然，這些疑慮並不會消解 Emden 詮釋的價值，而只會促使我們進一步思考尼采哲學中這些懸而未解的謎語。

肆、評價與結論：反思當代尼采研究

有關尼采自然主義的研究是如此的頻繁，以至於它在英美尼采學界成為了某種「正統」。(Ansell-Pearson & Emden, 2016: 1) 就在 Emden 一書出版後，《尼采研究期刊》(*Journal of Nietzsche Studies*) 在 2016 年出版了一期由 Keith Ansell-Pearson 與 Emden 共同編輯的特刊「尼采與自然主義的倫理學」，以回應出身自分析哲學傳統的學者對尼采的自然主義詮釋。而就在最近，Vanessa Lemm 則在其《自然人：尼采，哲學人類學與生命政治》(*Homo Natura. Nietzsche,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and Biopolitics*) 中指出，尼采的「自然」概念並不能單純放置在十九世紀自然科學的脈絡下理解，而是有其古希臘的根源。她不僅從哲學人類學的角度再次詮釋尼采的「自然人」(*homo natura*) 概念，同時亦將其帶入當代生命政治的討論中。(參 Lemm, 2020) 這些都顯示出，尼采有關自然、自然主義或自然人的論述仍未被窮盡。

Emden 的尼采詮釋或許如同所有的詮釋那般都會引來贊同與反對，然而除了具體的詮釋內容之外，本文認為我們或許可從當代尼采研究的角度對 Emden 的作品給出另一個意義上的肯定。當 Leiter 雖然肯定 Emden 的詮釋企圖但卻仍然認為其哲學詮釋是不成功的乃至充斥著概念上的混淆與不清晰時(參 Leiter, 2015)，Emden 的作品卻被一位德國評論者稱之為「過去幾十年尼采二手文獻中最重要的一出版物之一」。(Loukidelis, 2018: 329) 這種差異化的評價事實上仍根植於英美分析學者與歐陸學者在方法論路徑上的差異乃至於對「哲學」本身理解的不同。(部分)德國學者的文獻考證、文本分析以及歷史脈絡化工作往往被英美學者視作是懷古式的研究工作，從而與對哲學問題的思辨相去甚

遠。然而在德國學者看來，思想與概念均有其歷史，如果不了解歷史脈絡，而只將我們今日的概念理解以及理論框架（例如後設倫理學）帶入歷史中的哲學家，那麼這只會產生簡化乃至錯誤的詮釋（特別是在一些基本事實上）。這樣的人只會是尼采筆下最糟糕的讀者：「最糟糕的讀者就是那些像掠奪著的士兵一樣行事的人：他們拿走一些他們可以使用的東西，污染並弄亂其他的東西，然後誹謗整個整體」。(MA II VM 137, KSA 2, 436) 然而當部分德國學者埋頭於歷史文獻時，他們確實又失去了將哲學家重新激活並帶入當下時代的能力。正是在這個意義上，Emden 的作品提供了一個可能性，他不僅挖掘出了在哲學史上幾乎已被遺忘的早期新康德主義，更讓我們看到如何將尼采放置在歷史脈絡中盡可能忠實地詮釋尼采，但同時又能夠將尼采帶入當代的議題討論，從而挖掘出尼采哲學的豐富性與深刻性。本文相信，不論是尼采研究者、哲學史研究者亦或是分析哲學學者均可從 Emden 的作品中有所收穫。

參考文獻

一、尼采著作引用及縮寫

Colli, Giorgio & Montinari,azzino (Hrsg.) (1999). *Friedrich Nietzsche: Sämtliche Werke.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in 15 Bänden (=KSA)*. München: de Gruyter.

Colli, Giorgio & Montinari,azzino (Hrsg.) (1986). *Friedrich Nietzsche: Sämtliche Briefe.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in 8 Bänden (=KSB)*. München: de Gruyter.

AC (*Der Antichrist*)

FW (*Die Fröhliche Wissenschaft*)

GD (*Götzen-Dämmerung*)

GM (*Zur Genealogie der Moral*)

JGB (*Jenseits von Gut und Böse*)

MA (*Menschliches, Allzumenschliches*)

NL (*Nachlass*)

VM (*Vermischte Meinungen und Sprüche*)

二、其他文獻

Ansell-Pearson, Keith & Emden, Christian (2016). "Introduction: Nietzsche and the Ethics of Naturalism." *Journal of Nietzsche Studies*, 47, 1: 1-8.

Brusotti, Marco (2011). "Naturalismus? Perfektionismus? Nietzsche, die Genealogie und die Wissenschaften." Helmut Heit, Günter Abel & Marco Brusotti (Hrsg.). *Nietzsches Wissenschaftsphilosophie* (91-112). Berlin: de Gruyter.

- Brusotti, Marco & Siemens, Herman (2017). "Introduction." Marco Brusotti & Herman Siemens (eds.). *Nietzsche, Kant and the Problem of Metaphysics* (1-26). London: Bloomsbury.
- Campioni, Giuliano et al. (Hrsg.) (2003). *Nietzsches persönliche Bibliothek*. Berlin: de Gruyter.
- Constâncio, João (2011). "On Consciousness: Nietzsche's Departure from Schopenhauer." *Nietzsche-Studien*, 40: 1-42.
- Crescenzi, Luca (1994). "Verzeichnis der von Nietzsche aus der Universitätsbibliothek in Basel entliehenen Bücher." *Nietzsche-Studien*, 23: 388-442.
- Dellinger, Jakob (2012). "Sanitizing Nietzsche? Bemerkungen zur Tendenz eines 'naturalistischen' Nietzsche-Bildes." Renate Reschke & Marco Brusotti (Hrsg.). *"Einige werden posthum geboren". Nietzsches Wirkungen* (159-171). Berlin: de Gruyter.
- Emden, Christian (2005). *Nietzsche on Language, Consciousness and the Body*.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2008). *Friedrich Nietzsche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14). *Nietzsche's Naturalism: Philosophy and the Life Scienc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emes, Ken & Janaway, Christopher (2005). "Naturalism and Value in Nietzsche."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71, 3: 729-740.
- Heit, Helmut (2016). "Naturalizing Perspectives. On the Epistemology of Nietzsche's Experimental Naturalizations." *Nietzsche-Studien*, 45, 1: 56-80.
- Janaway, Christopher (2007). *Beyond Selflessness. Reading Nietzsche's Genea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Janaway, Christopher & Robertson, Simon (eds.) (2012). *Nietzsche, Naturalism, and Normativ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nge, Friedrich (1866). *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 und Kritik seiner Bedeutung in der Gegenwart*. Iserlohn: Verlag von J. Baedeker.
- Leiter, Brian (2002). *Nietzsche on Morality*. London: Routledge.
- (2015). "Nietzsche's Naturalism: Philosophy and the Life Scienc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otre Dame Philosophical Reviews*, Christopher Shields (ed.). 4 Dec. 2021, <<https://ndpr.nd.edu/reviews/nietzsche-s-naturalism-philosophy-and-the-life-sciences-in-the-nineteenth-century/>>.
- Lemm, Vanessa (2020). *Homo Natura. Nietzsche,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and Biopolitic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Liebmann, Otto (1865). *Kant und die Epigonen*. Stuttgart: Carl Schober.
- Loukidelis, Nikolaus (2018). "Philosophie und Lebenswissenschaften im 19. Jahrhundert: Der Fall Nietzsche." *Internationales Jahrbuch für philosophische Anthropologie*, 7, 1: 325-333.
- Lopes, Rogério (2011). "Methodologischer Naturalismus, epistemische Tugenden und Normativität bei Nietzsche." Helmut Heit, Günter Abel & Marco Brusotti (Hrsg.). *Nietzsches Wissenschaftsphilosophie* (113-124). Berlin: de Gruyter.
- Mittasch, Alwin (1952). *Friedrich Nietzsche als Naturphilosoph*. Stuttgart: Kröner Verlag.
- Railton, Peter (1989). "Naturalism and Prescriptivity." *Social Philosophy & Policy*, 7, 1: 151-174.
- Rouse, Joseph (2002). *How Scientific Practices Matter: Reclaiming Philosophical Natur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iccardi, Mattia (2014). "Nietzsche und die Erkenntnistheorie und Metaphysik." Helmut Heit & Lisa Heller (Hrsg.). *Handbuch. Nietzsche und die Wissenschaften* (242-264). Berlin: de Gruyter.
- Schacht, Richard (1983). *Nietzsche*. London: Routledge.
- (2012a). "Nietzsche's Naturalism and Normativity." Christopher Janaway & Simon Robertson (eds.). *Nietzsche, Naturalism, and Normativity* (236-25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12b). "Nietzsche's Naturalism." *Journal of Nietzsche Studies*, 43, 2: 185-212.
- Sommer, Andreas Urs (2012). "Nietzsche's Readings on Spinoza: A Contextualist Study, Particularly on the Reception of Kuno Fischer." *Journal of Nietzsche Studies*, 43, 2: 156-184.
- Stack, George (1983). *Lange and Nietzsche*. Berlin: de Gruyter.
- Williams, Bernard (1993). "Nietzsche's Minimalist Moral Psychology." *Europe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1, 1: 4-14.